

# 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

李中建 袁璐璐

**摘要：**跨区务工是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农村—城镇流动人口数据，估计了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检验了务工距离与个体特征变量间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务工距离与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存在着“正U型”曲线关系，务工在本县范围内，务工距离增加会引起就业质量下降，引起工资水平上升、工作时间缩减，并无益于就业稳定性增强及工作福利获取；务工一旦超出本县，务工距离的加大将有助于就业质量的提升。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体特征变量与务工距离之间的交互效应并不突出，表明农民工的家庭形态差异及居住地异质性在背后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农民工 务工距离 就业质量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 一、引言

民生问题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石，其中，就业又是民生之本。对中国 2.7 亿农民工而言，其就业质量总体上偏低，存在工资水平低、工作时间长、就业稳定性差、福利待遇缺失、工作安全性低及职业发展空间受限等诸多问题（高文书，2006；明娟、曾湘泉，2015）。还要看到，他们同时也是实现“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的目标群体，就业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其迁入城镇的可能性。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如何推进这一群体就业转型，实现从就业规模扩张到就业质量提升的成功跨越，应该成为政策和理论研究的优先方向。从现实看，现阶段中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建设的差异，农民工就业质量在流入地城镇层级上呈现梯次分布，相对于在小城镇和县级市的务工者，在地级市务工者的工资水平、工作稳定性及幸福感明显提高，彰显了远距离务工的优越性（宁光杰，2012；刘洪银，2015a；刘洪银，2015b；杨东亮、韩枫，2015）。无论从经验观察还是前期研究来看，在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诸多因素中，务工距离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由于农民工迁移形式的多元化，加之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通过探究务工距离与就业质量之间的关联，有助于把握未来农民工流动的方向，并从提升就业质量的维度，确定未来提升农民工收入、增

---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教育科学基金项目“职业技术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作用机理与改善措施”（项目编号：BJA140059）的资助。笔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中肯意见，但文责自负。

强工作稳定性、改进工作福利的工作重点，以切实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而以提升就业质量为标杆，精准定位城镇化的重点和方向。鉴于此，基于务工距离的视角探讨如何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相关文献并展开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及处理思路，并对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第四部分，借助计量分析模型探究农民工务工距离与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第五部分，进行交叉作用检验及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总结研究结果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 （一）文献回顾

就业质量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现有研究对就业质量的测度尚未达成统一意见。国际上关于就业质量的度量主要有：①国际劳工组织首倡的体面工作指标体系；②欧盟委员会的工作质量指数；③欧洲基金会的四维度就业质量指标体系；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生活福祉测量指标体系。整体而言，上述指标体系之间尽管存在差异，但大多考虑到了工作报酬、工作强度、工作安全性与健康、工作福利、工作稳定性以及职业发展空间等维度。此外，一些学者从个体角度出发，重点考察了工资水平、工作强度、工作安全性、工作稳定以及职业发展空间等内容（例如 Schroeder, 1994; Anker et al., 2003; Bonnet et al., 2003; Davoine and Erhel, 2006）。国内学者对就业质量的测度集中在工资水平、工作时间、社会福利待遇及就业稳定性等方面，同时也涉及工作环境、职业发展空间、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等。多数学者认为，工资水平能够正向反映劳动力就业质量，工作时间通过挤压闲暇时间而影响就业质量；同时，住房公积金以及工伤、失业、医疗保险等的享用能够为劳动力提供就业保护和福利，进而有效提升其就业质量；而工作稳定性也是反映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工作稳定性越强，劳动力越容易具备稳定的工资来源，并越有可能提升专用性人力资本（谢勇，2009；任义科等，2014；明娟、曾湘泉，2015；明娟，2016）。此外，随着对发展、健康和幸福认识的逐步深入，不少学者扩展了就业质量的范畴，认为工作安全性越好，职业发展空间越广阔，劳动力对所从事工作的满意度越高、幸福感越强，其就业质量就越高（苏丽峰，2013；石丹浙等，2014；聂伟、风笑天，2016；赵蒙成，2016）。

距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20世纪40年代在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引力模型充分肯定了距离在宏观层面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学者基于引力模型研究认为，距离不仅影响到旅游规模及贸易流量，也关系着城乡一体化进程（Zipf, 1946; Anderson and Wincoop., 2003; 刘红梅等，2012）。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上，距离对个体就业和生活的影响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少学者认为，迁移距离显著影响农民工的迁移决策及城市融入意愿等，较远的迁移距离会弱化子女随迁的概率并降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期望（梁宏、任焰 2010；张翼、周小刚，2012；宋锦、李实，2014；钱龙等，2016）。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表明，外出打工距离对劳动力工资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跨省流动劳动力的收入高于市内流动的劳动力；同时，流入更高层级的城镇也有助于提升劳动

力就业的稳定性（宁光杰，2012；王朝明、周宗社，2015；刘洪银，2015a）。此外，还有学者基于幸福感的视角认为，劳动力近距离流动和远距离流动优于中等距离流动（杨东亮、韩枫，2015）。总体来看，国内从务工距离的视角探讨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研究尚待深入，现有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务工距离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大多认为务工距离加大会单向促进收入增加，而务工距离对工作强度、就业稳定性等就业质量其它方面的作用还需进一步研究，且现有研究较多采用广东、重庆以及京津冀等局部地区的数据，亟需利用全国性的大样本数据来厘定二者之间的关系。

## （二）理论分析

家庭形态差异会导致务工距离与农民工就业质量高度相关。新迁移经济学（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认为，个体在做出最优迁移决策时不仅考虑个人效用最大化，还高度重视更大单元的相关群体“农户或家庭”利益的最大化（Haas, 2010; Taylor, 1999）。这充分肯定了家庭在个体迁移过程中的重要性。事实上，个体作为家庭成员之一，往往遵循家庭利益优于个体利益的原则进行决策，而传统家庭观念更重的农民工更为关注家庭利益。外出务工作为农民工迁移的一种主要形式，家庭因素在其就业决策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方面，从家庭人口规模来看，家庭因素会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其一，家庭人口规模越大，劳动力数量也就越多，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也就更明显和更稳定，存在着负责家务的若干家庭成员，这使得其他劳动力在进行外出务工决策时，能够充分考虑个体资源禀赋，侧重于个人效用最大化，进而实现高质量就业。其二，家庭人口规模越大，家庭所具有的社会资本数量越多，同时，社会资本质量高的可能性也越大。这不仅有助于家庭劳动力获取到高质量的就业信息，更可能在务工之前就对工作内容、报酬以及福利待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甚至还可能委托亲戚、朋友和邻居充当中介人，将自己介绍给或引入工作单位，从而实现高质量就业。另一方面，就家庭人口结构而言，家庭因素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事实上，当家庭中老人较多，或者处于中小学阶段的孩子较多时，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打工者会倾向于就近务工，以便更好地照顾家庭老人生活和上学子女。对于这种结构的家庭，家庭利益更为重要，家庭劳动力寻求工作时主要考虑工作稳定性，并兼顾薪酬水平，较易实现高质量就业。然而，如果家庭中有在读大学生，或者一两名适婚年龄的男子时，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打工者往往会选择集体外出务工，通常表现为夫妻结伴、父子结伴甚至是家庭成员联合前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打工。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劳动力迫于经济压力主要考虑工作的薪资问题，对于就业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等方面不甚重视，而其就业质量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务工地整体福利水平的高低，就业质量在这些劳动力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此外，农民工居住地的异质性也会导致其就业质量的差异。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劳动力市场扭曲导致人口迁移；而新迁移经济学强调居住地的市场不完全性才是人口迁移的动因，认为在欠发达地区，由于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不完善甚至没有，劳动力较难在当地获取创业资本，只能通过单独或者与其它家庭成员一起外出就业的形式来获取打工收入并降低风险。就中国而言，长期的城乡二元治理体制在推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农村地区的落后，农村劳动力为了提升自身的生活水平，不得不选择外出就业。而在不同地区，农村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这会影响劳动力的

就业选择和工作转换，进而影响其就业质量，并同时外现为务工距离的差异。

一方面，就居住地地形而言，居住地地形越复杂，当地的交通状况越差，通勤成本也就越高，劳动力在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往返所花费时间越多、成本越高，因而越倾向于远距离务工。同时，居住地地形的复杂程度也会影响当地的通信状况，进而影响当地的信息传递速度。比如，山区劳动力往往无法及时了解当地优良工作岗位的信息，因而倾向于前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务工。此外，山区劳动力在进行远距离务工时，需要付出更大的心理成本，他们往往通过“老乡带老乡”的方式外出务工，既相互之间提供情感支持，又增强对外界用工信息的掌握程度，从而更可能实现高质量就业。另一方面，从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倾向于就近务工，而居住地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劳动力倾向于远距离务工。其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具有更多的工作岗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工业化水平较高，钧瓷厂、煤矿企业、工艺品加工厂相对较多，而这些企业进行生产需要厂房车间、资金以及劳动力，这自然能提供众多工作岗位，进而优化当地的就业环境，有助于劳动力获得高质量的工作。其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交通设施更为完善。其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尤其重视当地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配备，而交通设施的完善，在方便本地企业发展的同时，也能够降低劳动力的通勤成本，既减少其通勤时间，又降低其通勤难度，从而有助于他们在本地实现高质量就业。

综上所述，务工距离是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同时，务工距离背后是务工者家庭形态的差异和居住地的异质性在发挥作用。本文拟利用 2013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农村—城镇流动人口数据，试图探索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作用效果，并检验务工距离是否与农民工个体特征变量存在交互效应，间接影响其就业质量。

### 三、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

####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 2013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的外来务工住户调查问卷。该调查涉及劳动力跨区流动频繁的 2 个直辖市及 15 个省份，它们包括：北京和上海（大都市区），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东部地区），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和山西（中部地区），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和云南（西部地区），黑龙江（东北地区）。问卷及抽样框的设计均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联合国内外专家共同完成。本文研究将 16~65 岁、目前正以雇员身份从事工资性工作的农业户籍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共获得有效样本 780 个。

#### （二）就业质量指标构建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测度，既参考了国内外学者的指标选取和测度方法，又结合了 2013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农村—城镇流动人口数据的特点，最终选取了 4 个分项指标，涵盖了工资水平、工作强度、就业稳定性和工作福利 4 个方面。具体而言，基于明娟（2016）所提出的客观指标测量模型，借鉴 Leschke and Watt（2014）使用的多维就业质量指数（multi-dimensional job quality index），并结合 Erhel et al.（2014）的做法，从以下 4 个方面进行评价：①工资水平，用月收入来衡量，并

将住房补贴和伙食补贴纳入其中；②工作强度，采用周工作时间来表示<sup>①</sup>；③就业稳定性，以是否签订固定或者长期劳动合同为标准；④工作福利，以是否享有工伤、失业、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来衡量。本文就业质量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第一步，将各分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x_{ij}^{nor} = \frac{(x_{ij} - \min_j)}{(\max_j - \min_j)} \quad (1)$$

(1) 式中， $x_{ij}^{nor}$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 $i$  代表农民工个体， $j$  代表就业质量的 4 个分项指标，其中， $j=1$  表示月收入， $j=2$  表示周工作时间， $j=3$  表示就业稳定性， $j=4$  表示是否享受工作福利。 $\max_j$  为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 $\min_j$  为  $j$  维度指标的最小值。同时，考虑到工作时间与就业质量负相关，本文用 1 减去标准化处理后该指标的差来获得周工作时间的反向指标。

第二步，明确各分项指标的权重。参考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基金会的做法，本文采用等权平均法（简单平均法）来计算就业质量指数；同时，为方便解释该指数的含义，对上述计算结果乘以 100，得到最终的就业质量指数：

$$Q_i = \frac{1}{4} \sum_{j=1}^4 x_{ij}^{nor} \times 100 \quad (2)$$

就业质量指标选取及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1。

表 1 就业质量指标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指标	赋值及含义	均值	标准差
工资水平	月收入（元）	2993.77	1431.45
工作时间	周工作时间（小时）	61.55	8.77
就业稳定性	已签订固定或长期劳动合同=1；无=0	0.24	0.43
工作福利	享有工伤、失业、生育保险或住房公积金=1；无=0	0.28	0.45
就业质量指数	取值为 0~100，分值越高，表示就业质量越好	43.63	23.10

注：工资水平均值根据原始工资水平数据进行单边缩尾（5%）处理后的样本计算；周工作时间均值根据原始日工作时间数据进行双边缩尾（5%）处理后的样本计算。

总体来看，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平均得分仅为 43.63，比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平均得分低了 18 个百分点，不难看出农民工就业质量整体上偏低，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就分项指标而言，一看在工资水平方面，农民工平均月工资收入接近 3000 元，表明近年来提升农民工薪资待遇的工作已取得较大进展，但较大的标准差也表明农民工内部薪资待遇存在较大分化；在工作时间方面，农

<sup>①</sup>周工作时间的度量较为困难，主要是因为对于农民工群体，尽管名义上存在着双休日，但往往由于监管的疏忽或双倍工资的引诱，周末仍旧继续工作。鉴于此，为减少偏差，本文用日工作小时数乘以 7 天作为周工作时间。

民工平均周工作时间接近 62 小时，比法定周工作时间 40 小时多了近 54%，说明其工作强度仍然较大；在就业稳定性方面，农民工固定或长期劳动合同签订率平均为 24%，固定或长期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说明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较差；在工作福利方面，农民工工伤、失业、医疗保险或住房公积金的享有率仅为 28%，可见，农民工在用工单位的福利待遇普遍并不好。

(三) 解释变量选取、处理及描述性统计

首先，对务工距离进行处理。依据问卷问题：“当前这份工作的工作地点：①家里/本居委会内（村内）；②居委会外街道（乡镇）内；③街道（乡镇）外区（县）内；④区（县）外市内；⑤市外省内；⑥省外；⑦其他。”在剔除选择⑦的样本后，本文将务工距离处理为定序变量，即村内=1，乡镇内他村=2，县内他镇=3，市内他县=4，省内他市=5，省外=6。不同务工距离上的样本数见表 2。

	村内	乡镇内他村	县内他镇	市内他县	省内他市	省外
样本数(个)	163	149	262	130	38	38

其次，对解释变量进行统计性描述，结果详见表 3。①务工距离。农民工务工距离（变量）的均值为 2.80，可见，农民工就业地点集中在“县内他镇”的最多，“村内”的次多，而省内他市和省外务工人数相对较少，呈现出近距离务工的特点。②基础教育。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53 年，稍高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年限。③工作经验。农民工平均务工年限约为 10.6 年，但标准差高达 7.35，表明农民工群体内部在外出务工时间上存在较大差异。④性别。样本中男女比例为 1.44: 1，说明农民工群体中男性较多。⑤婚姻状况。该变量的均值为 0.79，表明农民工群体多以已婚者为主。⑥工作获取方式。农民工的工作搜寻方式趋于多元化，有自己寻找，也有亲戚朋友介绍和公共部门介绍。

变量	赋值及含义	均值	标准差
务工距离	村内=1；乡镇内他村=2；县内他镇=3；市内他县=4；省内他市=5；省外=6	2.80	1.34
受教育年限	受教育年限（年）	9.53	2.90
工作经验	外出务工年限（年）	10.59	7.35
性别	男性=1；女性=0	0.59	0.49
婚姻状况	已婚=1；未婚、丧偶或离异=0	0.79	0.41
工作获取方式			
是否自己寻找	自己寻找=1；否=0	0.45	0.50
是否亲戚朋友介绍	亲戚朋友介绍=1；否=0	0.50	0.50
是否公共部门介绍	公共部门介绍=1；否=0	0.05	0.21

#### (四) 务工距离与就业质量关系

图 1 描述了务工距离与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随着务工距离的扩大，就业质量先下降后上升，呈现出“正 U 型”变动趋势。具体来说，当务工距离为 1 时，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为 47.56；当务工距离增加到 2 时，就业质量指数降幅超过 10%，减至 42.74；当务工距离进一步扩大到 3 时，就业质量继续下降，指数陷入 41.40 的低谷；同时，务工距离与就业质量的关系在此发生逆转，此后随着务工距离增大，就业质量指数将会攀升，最终达到 46.45 的高峰。基于二者之间的变动关系，本文初步认为，务工距离能够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但是，图 1 仅为描述性分析结果。一方面，由于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这种关系并不十分可信；另一方面，本文也无法准确把握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确切影响程度。为克服上述缺陷，本文接下来将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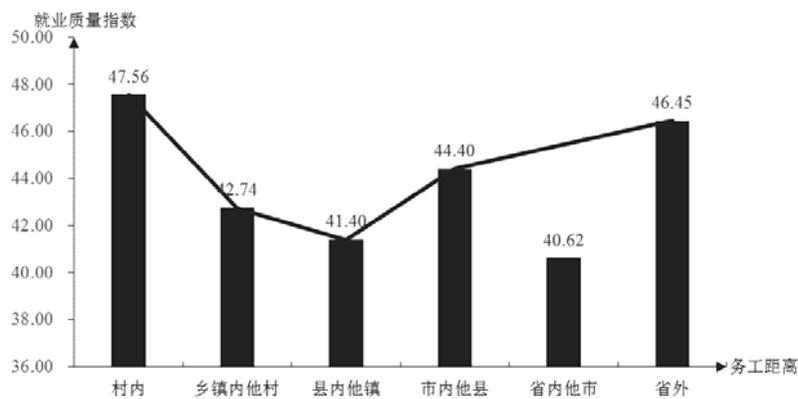


图 1 务工距离与就业质量的关系

注：尽管务工距离为 5 所对应的就业质量指数处于 40.62 的低位，但整体上依旧可以看出务工距离与就业质量之间先下降后上升的“正 U 型”变动趋势。通过对此异低值的进一步分析，本文发现，此距离层次上就业质量指数存在较为严重的左侧拖尾现象。这极可能是因为该距离层次上样本偏少，同时存在一定程度的测量误差，致使样本的信息量不足。

### 四、模型建立及估计

#### (一) 模型建立

本文分别采用 OLS 回归和 Probit 回归对就业质量及其分项指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体而言，就业质量指数、工资水平以及工作时间为定距变量，采用如下 OLS 回归模型：

$$y_i = \beta_0 + \beta_1 \text{dis} \tan ce_i + \beta_2 \text{dis} \tan ce_i^2 + \sum_{m=1}^M \gamma_m x_{im} + \varepsilon_i \quad (3)$$

就业稳定性和工作福利为定类变量，采用如下 Probit 回归模型：

$$p(y = 1 | x) = \beta_0 + \beta_1 \text{distance}_i + \beta_2 \text{distance}_i^2 + \sum_{m=1}^M \gamma_m x_{im} + \varepsilon_i \quad (4)$$

(3) 式中, 被解释变量  $y_i$  表示第  $i$  名样本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指数、工资水平、工作时间等定距变量; (4) 式中, 被解释变量  $p(y = 1 | x)$  表示第  $i$  名样本农民工签订固定或长期劳动合同的概率或获取工作福利的概率;  $\text{distance}_i$  为核心解释变量务工距离, 考虑到务工距离对就业质量的非线性影响, 特将其平方项纳入模型;  $x_{im}$  表示其他解释变量, 包括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性别、婚姻状况、工作获取方式;  $\varepsilon_i$  表示其它随机因素的影响。此外, (3) 式和 (4) 式中,  $\beta_0$  为常数项、 $\beta_1$ 、 $\beta_2$  分别为务工距离及其平方项的系数,  $\gamma_m$  为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

基于 (3) 式和 (4) 式, 本文分别对就业质量指数及其 4 个分项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与务工距离等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依次为回归 (1) ~ (5), 其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就业质量	工资水平	工作时间	就业稳定性	工作福利
务工距离	-8.9736*** (2.8247)	-661.6216*** (165.9162)	-2.0867** (1.0020)	-0.4253** (0.1685)	-0.5781*** (0.1622)
务工距离平方	1.2517*** (0.4482)	115.1938*** (26.3647)	0.2743* (0.1596)	0.0574** (0.0268)	0.0770*** (0.0258)
受教育年限	2.6518*** (0.3469)	80.3161*** (20.3623)	-0.4374*** (0.1267)	0.1356*** (0.0229)	0.1505*** (0.0222)
工作经验	0.3470** (0.1388)	9.5090 (8.1554)	-0.0540 (0.0510)	0.0132 (0.0086)	0.0219*** (0.0082)
性别	3.4258* (1.9852)	862.3975*** (116.5110)	1.7720** (0.7139)	0.1500 (0.1221)	0.1941 (0.1519)
婚姻状况	3.7883 (2.5566)	-21.2166 (148.5648)	-0.2202 (0.9295)	0.3228* (0.1639)	0.2098 (0.1523)
工作获取方式 (以“是否自己寻找”为参照组)					
是否亲戚朋友介绍	-1.4649 (2.0365)	-45.1780 (119.6150)	0.6794 (0.7320)	-0.0136 (0.1257)	-0.1174 (0.1195)
是否公共部门介绍	18.8614*** (6.0417)	519.6026 (346.9811)	-1.0011 (1.9515)	0.8818*** (0.3244)	0.4941 (0.3023)
R <sup>2</sup>	0.1538	0.1728	0.0451	—	—
Pseudo R2	—	—	—	0.0876	0.1014
Wald 卡方值	—	—	—	56.9700***	74.4900***
样本数	501	511	595	577	595

注: \*\*、\*、\*分别代表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 （二）估计结果分析

从表 4 可以看出，回归 1、回归 2 和回归 3 的  $R^2$  值相对较好，同时回归 4 和回归 5 的 Wald 卡方检验值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充分表明 OLS 回归模型和 Probit 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均较好，所选择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都有较好的解释能力。

1. 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正 U 型”曲线形式。表 4 中回归（1）的估计结果显示，务工距离一次项系数估计值为负，且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同时务工距离平方项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计算可得务工距离转折值  $distance_i^*$  为 3.58，处于“县内他镇”和“市内他县”之间<sup>①</sup>。这进一步验证了图 1 所示的结果，充分表明务工距离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呈“正 U 型”，且在“县内他镇”处发生逆转。这意味着，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务工距离囿于本县时，务工距离的增加会引起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降低，且务工距离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就业质量平均下降 8.97 个标准差，表明就近就地务工（乡镇务工）存在的潜在优势，也揭示了发挥乡镇产业优势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合理性。而当务工距离超出本县时，务工距离的增加则会带来就业质量的提高。这与刘洪银（2015a）、杨东亮、韩枫（2015）的研究发现较为接近，证实了市内流动和跨省流动农民工就业比县内流动就业具有优越性。

此外，回归（2）、回归（3）、回归（4）和回归（5）的估计结果还准确报告了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就业稳定性和工作福利的作用。具体而言，当务工距离限于本县时，务工距离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将会引起收入下降 661.62 个标准差，周工作时间会降低 2.09 个标准差，同时劳动合同签订和工作福利获取的概率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下降。这间接印证了 Jelili and Mzali（1998）的研究结论，即在选择无偏的情况下，在本地就业获得的收入要高于外出就业。然而，一旦务工距离超过本县，务工距离的增加则会带来收入的提高。也就是说，相对于小县城，赴地级市、省会城市及省外务工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收入水平，同时跨省流动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高于市内流动农民工。这进一步证实了宁光杰（2012）、王建国、李实（2015）和王朝明、周宗社（2015）的研究结论。同时，务工距离的增加还会带来工作时间的增加，并有助于就业稳定性增强以及工作福利的获取。

2. 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性别、工作获取方式等其它控制因素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不一致。由表 4 可知，受教育年限能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体现为收入增加、周工作时间下降、就业稳定性增强以及工作福利获取的可能性加大。这与钱芳等（2013）的研究结论相吻合。务工年限的增加也有助于农民工获得高质量的就业，尤其是获取工作福利。这是因为，随着务工年限的增加，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会增强，加上工作经验的积累，他们便于谋求到福利待遇更好的工作岗位。性别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较为显著，尤其体现在男性的工资更高、工作时间更长，而男性就业稳定性却与女性差别不大。这与任义科等（2015）的研究结果相近。就工作寻找方式而言，与自己

<sup>①</sup>转折点计算公式为  $x^* = -\hat{\beta}_1 / 2\hat{\beta}_2$ 。

寻找工作相比，亲戚朋友帮忙介绍工作并没有带来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而公共部门介绍则有助于农民工获得高质量的就业。这意味着就业服务中心等政府服务机构的设立确有良用，而亲戚朋友介绍工作的优越性却未体现出来。这与谢勇（2009）和彭国胜、陈成文（2009）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出入，可能是其样本代表性不强所致。

## 五、扩展讨论及稳健性检验

### （一）交互效应检验

本文第二部分理论分析表明，务工距离对就业质量产生直接影响的背后是农民工的家庭形态及居住地境况的异质性在发挥作用。然而，人力资本、性别及婚姻状况等与农民工就业状况密切相关，务工距离是否会借由这些个体特征因素间接作用于就业质量，仍有待探索。鉴于此，下文特将务工距离与受教育年限、务工距离与工作经验、务工距离与性别等 5 个交互项纳入模型，以便确定务工距离是否会借由这些个体特征因素间接作用于就业质量。

表 5 报告了含交互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因篇幅限制，本文省略了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性别、婚姻状况、工作获取方式等独立变量的估计结果，仅将距离、距离平方项以及各交互项的估计结果报告于表 5。表 5 中结果证实了距离与受教育年限、性别、婚姻状况三个个体特征变量间的交互效应。具体来说，距离与受教育年限交互项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说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民工选择远距离务工会引起其就业质量下降，这可以解释现实中部分较高学历者不大青睐外出务工的现象；同时，距离与性别、婚姻状况的联合交互项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已婚男性农民工选择远距离务工有助于提升其就业质量；此外，距离与工作经验、性别、婚姻状况的交互项在 10% 的置信水平上不显著。总体来看，务工距离与受教育年限交互项、务工距离与性别和婚姻联合交互项的回归系数相对较小，且务工距离与性别和婚姻等联合交互项的显著性水平为 10%。这表明，距离确实通过受教育年限、性别和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在发挥作用，但这种交互效应并不突出，意味着农民工家庭形态的差异及居住地的异质性在背后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致使务工距离直接作用于农民工就业质量。

表 5 交互效应检验结果

	回归 (6)	回归 (7)	回归 (8)	回归 (9)	回归 (10)	回归 (11)
务工距离	-8.9736*** (2.8247)	-8.3251*** (2.8065)	-8.7946*** (2.8345)	-8.5522*** (2.8268)	-9.8921*** (3.0042)	-7.9806*** (2.8403)
务工距离平方项	1.2517*** (0.4482)	2.3273*** (0.5967)	1.0818** (0.4667)	1.1066** (0.4715)	1.1277** (0.4514)	0.9215** (0.4756)
务工距离×受教育年限	—	-0.1250*** (0.0443)	—	—	—	—
务工距离×工作经验	—	—	0.0162 (0.0174)	—	—	—

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

务工距离×性别	—	—	—	0.1584 (0.2394)	—	—
务工距离×婚姻状况	—	—	—	—	2.2806 (1.7883)	—
务工距离×性别 ×婚姻状况	—	—	—	—	—	0.3753* (0.2156)
R <sup>2</sup>	0.1538	0.1659	0.1538	0.1531	0.1552	0.1575
样本数	501	500	500	500	500	500

注：\*\*\*、\*\*、\*分别代表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 （二）稳健性分析

为检验本文第四部分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特对就业质量分项测度指标进行变换。具体来说，第一，前文依据是否签订长期或固定劳动合同来确定农民工是否实现稳定就业，但长期或固定劳动合同的签订状况与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规范程度存在较大关联，劳动力市场规范程度高的地区，长期或固定劳动合同签订情况更普遍。这意味着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高低可能是地区内生选择的结果，而采用农民工个体的工作转换次数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缺陷。下文将采用工作转换次数来重新界定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并对新的就业质量指数进行估计（即稳健性检验一）。第二，前文将工作福利定义为“是否享有工伤、失业、生育保险或住房公积金”，而未将养老保险纳入工作福利的范畴。这可能会高估农民工的工作福利状况，并影响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度量。下文将养老保险纳入工作福利的范畴，重新定义劳保福利为“是否享有养老、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并对新的就业质量指数进行估计（即稳健性检验二）。第三，考虑到职业安全与健康也是劳动力就业质量的重要体现，尤其对多在建筑业、采掘业、制造业等行业工作的农民工更为重要，而学者通常采用工作对身体损害程度评分、有无劳动合同等指标来测量职业安全与健康，本文利用“劳动力由于生病或受伤等原因不能正常工作、上学和生活的天数”来反向推定农民工的职业安全与健康，并对新的就业质量指数进行估计（稳健性检验三）。

表 6 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结果。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性别等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仅将务工距离、务工距离平方项的估计结果报告于表 6。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务工距离、务工距离平方项的回归系数符号与标准估计模型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前文标准估计模型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此外，稳健性检验一、稳健性检验二和稳健性检验三所对应的务工距离转折值  $distance_i^*$  分别为 3.38、3.62 和 3.57，均处于 3 和 4 之间，与标准估计模型所对应的务工距离转折值基本一致。这表明，就业质量指数分项指标选取的差异并不会改变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作用性质，进而验证了前文标准估计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标准估计模型	稳健性检验一	稳健性检验二	稳健性检验三
--	--------	--------	--------	--------

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

务工距离	-8.9736 <sup>***</sup> (2.8247)	-4.9275 <sup>**</sup> (1.9606)	-9.9578 <sup>***</sup> (2.5423)	-7.6584 <sup>***</sup> (2.4585)
务工距离平方	1.2517 <sup>***</sup> (0.4482)	0.7283 <sup>**</sup> (0.3112)	1.3770 <sup>***</sup> (0.4029)	1.0602 <sup>***</sup> (0.3895)
R <sup>2</sup>	0.1538	0.1327	0.1124	0.1362
样本数	501	508	500	498

注：\*\*\*、\*\*、\*分别代表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 2013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CHIP) 农村—城镇流动人口数据，估计了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务工距离与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存在着“正 U 型”曲线关系。具体而言，务工在本县范围内，务工距离增加会引起就业质量下降，带来工资水平下降、工作时间缩减，并无益于就业稳定性增强及工作福利获取；而务工距离一旦超出本县，上述作用结果则会发生逆转。进一步地，本文对务工距离与人力资本及个体特征间的交互效应进行了检验，发现务工距离确实通过受教育年限、性别和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在发挥作用，但这种交互效应并不突出，表明农民工家庭形态的差异及居住地的异质性在背后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致使务工距离直接作用于农民工就业质量。

基于上述结论，为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一要全方位支持边远偏僻山区农民奔赴省外务工。不仅要倡导设立乡镇就业服务中心，及时公布就业信息，减少外出务工的盲目性，促进山区外出农民工与外部工作岗位有效对接，还可制定外出务工家庭优惠政策，定期发放补贴，关爱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为农民工外出务工解决后顾之忧，同时要重视农村基础教育，特别是配置优质师资，同时鼓励开办乡镇培训项目，提升当地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以便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就业。二要多渠道促进平原地区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一方面是优化乡镇就业环境，提高招商引资质量，优先吸收用工规范的外来企业入驻，以提供更多的本地优质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积极为他们提供小额担保贷款支持，并开展系列创业培训，提升农民工就业创业能力。三是构建全国性的劳动力就业质量指标，推进劳动力市场规范化，掌握各地就业质量信息，并向社会公布各地就业质量信息，为农民工和各类劳动力流动迁移提供参考。

### 参考文献

- 1.高文书，2006：《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及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为例》，《中国农村经济》第 1 期。
- 2.梁宏、任焰，2010：《流动，还是留守？——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的决定因素分析》，《人口研究》第 2 期。
- 3.刘红梅、张忠杰、王克强，2012：《中国城乡一体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引力模型》，《中国农村经济》第 8 期。

- 4.刘洪银, 2015a: 《“农二代”城镇层级流动对就业改进的梯次影响》,《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第4期。
- 5.刘洪银, 2015b: 《“农二代”城镇层级流动对打工收入增长的影响》,《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6.明娟、曾湘泉, 2015: 《工作转换与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 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经济学动态》第12期。
- 7.明娟, 2016: 《农民工就业质量状况及变动趋势》,《城市问题》第3期。
- 8.宁光杰, 2012: 《自选择与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地区收入差异——兼论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经济研究》第2期。
- 9.聂伟、风笑天, 2016: 《就业质量、社会交往与农民工入户意愿——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调查》,《农业经济问题》第6期。
- 10.彭国胜、陈成文, 2009: 《社会资本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基于长沙市的实证调查》,《湖北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 11.钱芳、周小刚、胡凯, 2013: 《受教育年限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实证研究——基于一项江西地区的问卷调查》,《教育学术月刊》第7期。
- 12.钱龙、钱文荣、洪名勇, 2016: 《就近务工提升了农民工城镇化意愿吗——基于贵阳市的调查》,《农业现代化研究》第1期。
- 13.任义科、王林、杜海峰, 2015: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经济经纬》第2期。
- 14.石丹浙、赖德胜、李宏兵, 2014: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经济经纬》第3期。
- 15.宋锦、李实, 2014: 《农民工子女随迁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 16.苏丽锋, 2013: 《我国新时期个人就业质量研究——基于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经济学家》第7期。
- 17.王朝明、周宗社, 2015: 《就业流动人口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模型估计与政策涵义——基于重庆的经验数据》,《天府新论》第1期。
- 18.王建国、李实, 2015: 《大城市的农民工工资水平高吗?》,《管理世界》第1期。
- 19.谢勇, 2009: 《基于就业主体视角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为例》,《财贸研究》第5期。
- 20.杨东亮、韩枫, 2015: 《京津冀地区青年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青年研究》第4期。
- 21.赵蒙成, 2016: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中州学刊》第2期。
- 22.张翼、周小刚, 2012: 《我国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状况调查报告》,《调研世界》第1期。
- 23.Anderson, J. E., and E. V. Wincoop, 2003, “Gravity with Gravitas: A Solution to the Border Puzz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1): 170-192.
- 24.Anker, R., I. Chernyshev, P. Egger, F. Mehran, and J. A. Ritter, 2003, “Measuring Decent Work with Statistical Indicator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42(2): 147-178.
- 25.Jelili, R. B., and H. Mzali, 1998,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Self-selection in Tunisia”,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77(4): 347-60.
- 26.Bonnet, F., J. B. Figueiredo, and G. Standing, 2003, “A Family of Decent Work Indexe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42(2): 213-238.

27.Davoine, L., and C. Erhel, 2006, "Monitoring Employment Quality in Europ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Indicators and Beyond", *Université Paris I Panthéon-Sorbonne (Post-Print and Working Papers)*, 147(2-3): 163-198.

28.Erhel, C., M. Guergoat-Larivière, J. Leschke, and A. Watt, 2014, "Trends in Job Quality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for the EU/Tendances de la Qualité de L'emploi Pendant la Crise: Une Approche Européenne Comparative", *Université Paris I Panthéon-Sorbonne Post-Print and Working Papers* 14.

29.Haas, H. D., 2010,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4(1): 227-264.

30.Leschke, J., and A. Watt, 2014, "Challenges in Constructing a Multi-dimensional European Job Quality Index",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8(1): 1-31.

31.Schroeder, F. K., 1994, "Braille Usage: Perspectives of Legally Blind Adul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School Administrators", thesis (Ph.D.) of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Albuquerque, America.

32.Taylor, E. J., 1999,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ur Migration and the Role of Remittances in the Migration Proces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37(1): 63-88.

33.Zipf, G. K., 1946, "The P1P2/D Hypothesis: On the Intercity Movement of Pers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1(6): 677-686.

(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商学院)

(责任编辑: 午言)

## The Effects of Working Distance on Employment Qualit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Li Zhongjian Yuan Lulu

**Abstract:** Inter-regional employmen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on the labor market for migrant workers. This article estimates the effects of working distance on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quality, and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 capital, individual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working distance. The study uses survey data of rural-urban migrant population in 2013 from the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 It finds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distance and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quality. In contexts where migrant workers are employed within the county boundary, the increase in working distance leads to a decrease in employment quality, resulting in less incomes, shorter working hours, lower job stability and smaller probability to be covered by social security for migrant workers. However, in contexts where migrant workers are employed beyond the county boundary, the extension of working distance can improve employment quality. In addition, the analysis does not show a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apital, individual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migrant workers' working distance, which indicates that family differences and residence heterogeneity of migrant workers may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Key Words:** Rural Migrant Worker; Working Distance; Employment Quality